

# 古代江南地区怎样规复生态

■ 冯贤亮

对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变迁的考察，古人有很多记述。水利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公共工程，是农业生产的基础。在兴举水利工程时，熟识地理环境、注意区域的差异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，有助于更好地规复生态、改善环境与保障民生、发展经济。

## 大规模开发地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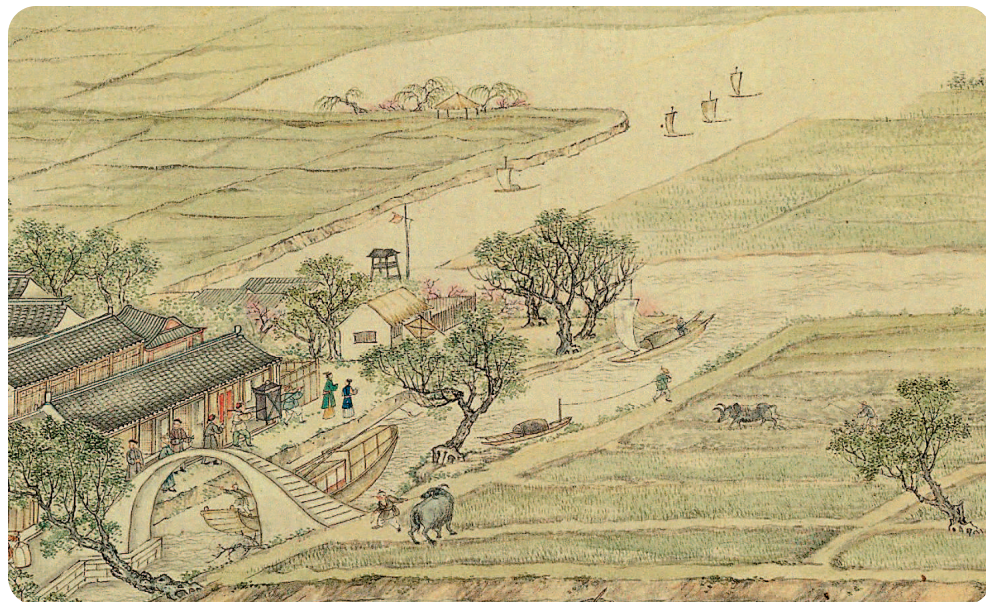
大概从春秋时期开始，太湖流域、成都盆地、关中平原、华北平原等基本经济区域开发力度不断加深。唐宋时代，我国气候环境整体上属于温暖湿润状态。尽管当中有若干年份出现过运河冰封或南方荔枝被冻死的极端现象，但总体上是一个回暖的时期。明清两代处于全球范围内的冰河扩张时期，故也称“明清小冰期”。根据明末清初《北游录》等资料的物候记载，可以推断北京地区冬季气温比今天约低2℃。

唐宋以后开发最早的那些地方，像河北平原，天然植被减少，影响到生态平衡。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破坏、过度垦殖以及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下，地表出现严重侵蚀，沙化面积大幅扩大。

本来，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区、文化区集中在北方或关中，北宋时期则基本转移至黄河下游。《水浒传》中讲到的河北大名府，就是北宋的四大京之一，繁华程度可与东京开封府媲美。据陆游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的说法，北宋为了营建这个京城，耗费了5年时间，耗去大量的木材及相关资源，日常生活中的燃料也多来自木材。因而，植被日渐稀少，甚至连经济作物桑树都成了建筑材料、生活燃料的替代品。欧阳修在《文忠集》中感言：“澶州、濮州地少林木，即今濮州之民无木植送纳，尽伐桑柘纳官。”

此时的黄河，一度泛滥严重，较大的改道约平均10年发生一次。繁华的大名府境内，开始“芦茅相望，斥卤频生”。除了这些，还有可怕的旱灾与蝗灾。明代徐光启在《农政全书》中指出，蝗灾多集中于“幽燕以南，长淮以北，青兖以西，梁宋以东”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历史上我国经济重心南移发生在两宋之际，是有一定环境背景的。加之南方不像北方长期饱受战争摧残和



《姑苏繁华图》所绘江南水乡景观。

资料图片

各族人民内迁冲击，区域经济发展得以保持平稳。南宋时期，南方的经济地位已跃居全国前列并持续兴盛，以至有“天下赋税多出江南”的说法。

唐宋以来，南方地利得到了大规模开发。许多荒芜的洼地、山林、滩涂等，受到官方与民间的重视，通过各种各样的经营方式，基本上都改造成了可耕地，并在周围衍生出一系列聚落。

在太湖平原，低洼的泥塘通过修筑堤围、放水排干，成为肥美的农田。各种河、湖、港、浜、塘、浦、泾、荡、漕、淹、溇等自然水体形态，在人工改造后构成了比较有序的水文系统。由此，有了所谓“纵而为浜，横而为塘”“大者为港，次者为浦，转而为泾，分而为浜，回而为湾，合而为汇，派而为沟、为漕”的明确区分与称呼。这些都是水乡泽国发展的重要环境基础。

## 人工改造环境

隐居在浙江桐乡的理论学家张履祥，在农村教书的同时，抄辑湖州一个沈姓乡居地主

的《农书》，与家人研究农桑生产技术，并雇工经营桑地与稻田。他强调“一方有一方之产物”，所谓“山之竹木，海之鱼盐，泽国菱芡，斥卤木棉，莽乡羊豕之类”。田土的肥瘠高下不等，对民众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。

从整个水系或地形上看，杭州属于嘉、湖的上游地区。清代水利专家指出，这里发生的所有水患根本在于临安、余杭一带的棚民垦山导致山土疏松，雨期容易发生大规模的水土流失。上游的不安会导致下游的嘉、湖地区遭遇更多危难，连带苏、松地区也会受到影响。

环境影响生存方式，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有其价值。江阴人李诩在其晚年所撰的《戒庵老人漫笔》中写了一个农民如何致富的事情：

常熟人谈参，在家排行第三，生活俭朴，但有商业头脑。他看到乡民为了追求渔业上的利益而抛弃大量洼洼的田地，就以很低的价格收购过来，将最低洼的地方开辟成鱼塘；周边筑上高塍，既可以防泄，又可以耕作。

在这些池塘里，谈参全部养鱼，又在池塘之上搭建房子养猪，猪舍变得凉快起来，猪粪又可以养鱼，可谓两相得益。在开垦好的田塍上，平阜的种果树，汗泽的种菰，可耕的种蔬

菜；其他如鸟凫昆虫之类，都可以设计罗取。谈参还在家中摆好几个储物廪，按照不同的收获品分类放置，每个廪满了就往外销售。每个月可以卖好几次，收益颇丰。

这是一个人工改造环境的成功典型，也符合生态农业的思想。

## 重视兴修水利

在江南地区，水利工作的核心是如何在雨期顺利排除过剩的水量，以保证农业的稳产、高产。

宋代以来，人们十分重视太湖平原的水利工作。宋人单潜《吴中水利书》中指出，苏州、常州、湖州三府之水为患最久。从溧阳五堰以东到吴江，好似人的身体：“五堰其首，宜兴荆溪其咽喉，百渎其心，震泽其腹，旁通震泽众渎其络脉众窍，吴江则其足也。”这是着眼于整个太湖流域来谈水利大势的，具有理论指导意义。

史料表明，嘉靖至万历年间，是明代经济社会相对繁荣富庶的阶段。然而，整个环境的问题也表现得较为严峻。比如，河港水利的淤塞，水旱疫病的发生，山林植被的滥垦，等等。

特别是，人们在倡导水利的同时，对水利的荒怠也时常发生。在乡村，官豪富室每遇涨滩，就希图承佃开发，或者将池塘占据养鱼，将湮塞之处霸作私田进行垦种。归有光还指出，地方官员贪图其中的短利，对地方豪民这种侵占沿江淤地、广种芦苇等水生作物的行为不但不予以阻止，反而规取其税，采取了纵容的态度。

嘉靖四十四年，归有光考中进士，即任长兴知县。这个时候的明朝，以宫廷政治的不良深为时人所诟评。在位的嘉靖皇帝崇信道教，整天不上朝，在宫内炼所谓长生不老的丹药。而在地方上，天灾人祸不断，世道大有凄惨之态。在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，由于环境的破坏和水利的长期荒怠，以及断续发生的倭寇之乱，民生显得颇为艰难。

归有光到长兴做官时，正值天灾人祸剧烈之期。江南还发生了较重的旱灾，夏秋之际农田中的禾苗枯死。归有光重视兴修水利，以协调解决水旱的问题。但关于他的水利思想，直到隆庆三年才被新任巡抚海瑞付诸实践，获得较好的成效。由此，归有光的水利观点开始为后世广泛称引。

（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）

# 抓大政以利国 发善心以恤民

■ 王兆贵

子产执政郑国政务20多年深受百姓爱戴，《礼记》赞他“犹众人之母也”。子产去世时，“郑人皆哭泣，悲之如亡亲戚”。

子产治理郑国期间，曾用自己乘坐的车子助人渡河。孟子听闻后借题议论：子产心肠好，却不知为政之道。如果十一月建好行人的桥，十二月建好通车的桥，百姓就不会为过河发愁了。

孟子的这番议论，大致想阐明这样一个道理：为政之道在于尚大德、识大体、办实事，而不必事事躬亲施小惠。这一治国理念，总体上得到后世推崇。

诸葛亮在处理蜀国政务时就曾说：“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。”施政要从全局上解决普遍性问题、惠及大多数人，以小惠悦人不仅不可取，还有沽名钓誉之嫌。换成今天的说法，就是“作秀”。

那么，子产真的是在作秀吗？他的做法真的不可取吗？

春秋晚期的郑国，外有齐秦晋楚强邻环伺，内有七大家族明争暗斗，政局很不稳定。子产主政后礼法并重、宽猛相济，在采取自强图存的外交策略稳定周边之时，积极推行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变革。

一是“作封洫”，就是划清地界，以防发生权属纷争；挖掘沟渠，以利排灌畅通；承认私田并按占有量征税，以限制贵族势力侵吞田产；健全户籍，合理编组，以形成良好的城乡社会秩序。

二是“作丘赋”，就是建立与“作封洫”相配套的军赋制度，按土地占有量分担军需军备。

三是“铸刑鼎”，就是把刑律铸在鼎上，公布于众。史书记载，子产执政一年，浪荡子不再轻浮嬉戏，老年人不必矜重物，儿童也不用干农活；两年后，市场商人虚抬物价；三年过去，人们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；四年后，农民收工不必把农具带回家；五年后，男子不需服役。

《尚书》云：“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。”范仲淹进一步解释：“圣人之德，惟在善政，善政之要，惟在养民。”善政即仁政，其核心是以民为本。

子产虽为“小国之相”，却获得晋楚等大国尊敬。孔子将其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仁爱精神，看作古代先贤的遗风。韩愈还写下《子产不毁乡校颂》，称赞子产是执政者的楷模和典范。

回到孟子的点评，焦点集中在大德与小惠的关系上。古往今来，多数人的看法倾向于“为政不能止乎惠”，但也不应把大德与小惠对立起来，讲大德而废小惠。作为一国之相，在庙堂要抓大政以利国，到乡间要发善心以恤民，二者都是为政之德，怎能绝然分开？

这不禁让人想起庄周贷粟的故事。对于“涸辙之鲋”来说，得斗升之水便可活命；引西江水来救，恐怕它早就变成干鱼了。掘斗升之水虽是小惠，却比引西江之水这样的大德及时得多。

这就像火焰无际的太阳也有照不到的角落一样，再完善的制度也不可能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和行为，再宏大的政策也不可能惠及所有人群，再富有的国度也有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。

就拿架桥一事来说，并非所有河流的所有区段都需要架桥。即使需要架桥的区段，也不是所有的堤岸都有条件架桥。假如是条浅窄的季节河，过河的人又不多，未必一定要架桥。子产出行时无意间看到有人难以渡河，便施以援手，有何不可？

■ 郑言

白居易不仅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，还喜爱栽植树木花草，每到一地为官都会留下许多相关的诗歌、故事。

江州——43岁那年，白居易贬为江州（今江西九江）司马。

他把庐山上的桂树移栽在司马厅前，并作诗一首：“天台岭上凌霜树，司马厅前委地丛。一种不生明月里，山中犹校胜尘中。”

他还称赞桂树：“偃蹇月中桂，结根依青天。天风绕月起，吹子下人间。飘零委何处，乃落匡庐山。”

江州的杜鹃花很多，“杜鹃啼时花扑扑，九江三月杜鹃来，一声催得一枝开”。白居易很喜欢杜鹃花，赞道“闲折两枝持在手，细看似不似人间”。

他还在官舍和庭院种满了各种树木花果，

# 栽松满后院 种柳荫前墀

“栽松满后院，种柳荫前墀……移花夹暖室，徙竹覆寒池”，结果是“池水变绿色，池劳动清辉。寻芳弄水坐，终日心熙熙”。

忠州——担任忠州（今重庆忠县）刺史期间，白居易写了不少植树诗。《东坡种花》云：“百果参杂种，千枝次第开。”《种桃杏》云：“无论海角与天涯，大抵心安即是家。路远谁能念乡曲，年深兼欲忘京华。忠州且作三年计，种杏栽桃拟待花。”《东溪种柳》云：“富贵本非望，功名须待时。不种东溪柳，端坐欲何为？”白居易被召回长安后，仍时常忆起忠州岁

月，感叹“每看阙下丹青树，不忘天边锦绣林……花含春意无分别，物感人情有浅深”，期望“花林好住莫憔悴，春至但知依旧春。楼上明年新太守，不妨还是爱花人”。

杭州——杭州春天多雨，秋天干旱，钱塘湖水既要补充到运河保持水位，又要满足农田灌溉，故需保持一定水位。

白居易上任杭州刺史后，决定从西湖的钱塘门到余杭门之间修筑一条护湖长堤。在精密测算的基础上，他亲自主持完成了这条长堤的修筑。为进一步保护堤坝，白居易还带领民众在堤上

栽植杨柳等，绿荫环抱，垂柳依依。平时西湖积蓄雨水、山泉，遇到天旱则放水灌田，受益田亩达千顷。

苏州——54岁那年，白居易被任命为苏州刺史。他主持疏通山塘河一带的沼泽地，从阊门至虎丘，长七里。

史书记载，白居易“始凿渠以通南北而达运河”，还在通济桥至虎丘西山桥的塘堤上种植桃李莲荷数千。

《虎丘寺路》云：“自开山寺路，水陆往来频。银勒牵骄马，花船载丽人。芰荷生欲遍，桃李种仍新。好住湖堤上，长留一道春。”

植树是古老的园林绿化树种，寿命可长达数千年。白居易在州宅北池亲手栽植植树，世人将其称之为“白公松”。

白居易在苏州任职时间虽短却成绩斐然，城乡绿化环境焕然一新，可谓“水光红漾漾，树色绿漫漫”“人烟树色无罅隙，十里一片青茫茫”。

# 文明餐饮 杜绝浪费

# 将光盘行动 进行到底

